

由“丙寅词”看天津近代社会

董丛林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冯文洵所作《丙寅天津竹枝词》,或谓其“是一部天津活的地方志,也是一个天津社会的万花筒”。藉以可一窥开埠及其他事变对该城的政治、经济影响,特别是其社会生活与风习情状。而冯文洵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作品,自与他特定的生平履历和情怀分不开。将该作品所展示的关于近代天津社会的斑斑点点,有选择性地串接和整合起来予以审视和解读,对认识天津社会变迁当有助益。

关键词:《丙寅天津竹枝词》;冯文洵;天津近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K 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015-08

冯文洵所作《丙寅天津竹枝词》(简称“丙寅词”),凡 298 首(皆无题)。如此由一人专就一个城市作偌多竹枝词,恐非多见。或谓其“是一部天津活的地方志,也是一个天津社会的万花筒”^{[1](P223)},诚哉斯言。本文拟先从两大方面解析“丙寅词”对天津近代社会情状的反映,最后梳理考察作者履历概况及与天津的因缘,以明其主观条件,并简说其作品的史料意义。

一、关于开埠及其他事变的政治、经济影响

天津近代社会变迁,最显著的影响事件首先是经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辟为通商口岸。自此之后,这个城市的面貌开始发生“转型”性变化,故可说开埠在天津近代城市变迁史上具有“发轫”性意义,当然这也牵系着此前该城多年的历史。

“曩隶渔阳旧版图,角飞城即古漂榆。明初置卫今商埠,水陆交通此转枢。”这是“丙寅词”的开篇第一首,其后有这样的文字注说:“天津在前汉时属幽州渔阳郡为泉州县。角飞城即漂榆故城,在天津府东。明永乐年置卫。清雍正三年改卫为州,九年设府改州为县。咸丰十年始辟租界。轮轨交通,行旅称便。”^{[2](P460~461)}这可以说是对天津历史的一个简要追溯。天津作为正式城市(不算先前所谓“城市聚落”)的历史并不算特别悠久。明朝燕王朱棣与其侄

朱允炆争夺帝位,率兵从直沽渡河南下,其称帝(年号永乐)后赐此地名曰“天津”,意思是天子经过的渡口,并且在这里设“卫”所(“天津卫”之称便由此而来)。“卫”虽然只是军事建置,但这里筑起城垣,有了城市形制,也有了发展的有利契机。到清朝初年,这里便有相关“州”、“府”、“县”政区治所的设置。据进入晚清之际编刊的《津门保甲图说》中提供的资料,天津县城内有32 761户,198 716人^{[3](P100)}。城市人口规模达到近 20 万,在当时已经应算不小的城市了。不过,尽管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这里就有与英国的直接接触,但直至开埠前,其城市面貌应该说还基本是“传统型”的,到开埠以后其“转型”才“突飞猛进”。

到民国丙寅(1926年),时过六十多年,这中间多经事变,包括庚子事变、民国代清、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但社会性质并无变化,中国仍处半殖民地地位,天津地方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亦无实质性改易。这种“变”与“不变”的情状,在“丙寅词”中也反映出来。“万国长桥跨海河,商廛比栉外侨多。自经参战收租界,特别区添德奥俄。”其后注及,海河上的“万国桥”俗称“法国大桥”,“德、奥租界民国六年收回,俄租界民九收回,改为特别一、二、三区”^{[2](P461)}。“外侨”在天津的大量聚集,就是开埠通商和广辟租界的直接结果。就租界而言,最高峰时,这里曾有九个国家(英、法、美、德、意、俄、日、奥、比)者。天津又

收稿日期:2013-11-21

作者简介:董丛林(1952-),男,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研究。

是最早开始收回租界的城市。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奥宣战,遂得以收回天津德、奥两国租界。至于俄国租界,是因为该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在华的一切特权,包括租界,经双方谈判,天津俄租界由中国收回。这样,先后收回的三国租界,也就改作一、二、三“特别区”。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开始收回租界的成局本身,对中国来说自然是好事。当然,全面收回租界,还是以后的事情。

至于洋人和租界带给中国的,可以说是侵略祸害和派生性的“文明示范”作用兼具。对此,“丙寅词”中并没有直接的分析,但其所揭示的具体现象,有助于印证我们的上述观点。“避居租界日纷纷,界划鸿沟畛域分。鹿角杈桠森电网,为防土匪与逃军。”其后解说:“每遇警变,居民纷纷逃入租界。外兵严备于界口,安设木栏,罩以电网。”^{[2](P499)}表面上看,租界似乎成了天津居民防范“匪变”的避难所,但更实质的问题在于,租界成为列强在华的“国中之国”,划界驻军置民,壁垒森严,显然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与中国争夺民众的据点。那么,租界就真的能保障安全吗?“丙寅词”中有曰:“漫云租界托安全,劫案年来见不鲜。肉票赎回须钞票,骇人五万五千元。”注谓:“去年日租界发生某议员被绑事。”连有议员身份的人都在租界被绑票,被索五万五千元大洋的巨额赎金,可见事情之严重了。至于“外侨”和租界派生性的“文明示范”作用,在市政建设、科技事物发展、社会风习趋新等方面都有体现(后及)。“丙寅词”中有道:“胜迹来游紫竹林,相传古刹供观音。市场商会名犹在,梵宇不知何处寻。”注谓:“紫竹林在法租界,庙已拆毁,惟紫竹林华商公会名尚存在。又天祥商场招牌上犹大书‘紫竹林’三字。”^{[2](P466)}此词看来就是实写紫竹林的,这里我们不妨将这“紫竹林”视作租界区的代称,“梵宇”则可视作对租界地方中国旧有的指代。由于辟作租界,早已是“梵宇不知何处寻”了,只有与“商”字有联系的事物尚或留其踪迹,而吸引游人的当主要是一派洋场“胜迹”。可以想见,强权罪恶、奢靡淫烂之中,自也夹带时代文明之花。

自开埠到民国丙寅的这六十多年间,天津地当诸多事变之处,血火交织,变迁沧桑。对此,“丙寅词”中自然会涉笔触及,抒怀感叹。“视死如归痛谢公,巍然祠宇表双忠。记闻赛会重三日,胜似蟠桃福寿宫。”^{[2](P468)}据注,“祠宇”是指城南驴市口的谢公祠,“双忠”是指于此并祀的谢子澄和佟鉴两人。前

者为天津知县,后者为副都统,都是当年为抵御“粤逆犯津”而死(佟被记为“阵亡”,查谢则是绝境中沉河而死)。既然将太平军称作“粤逆”,而褒扬谢、佟为“双忠”,“丙寅词”作者于此的政治立场显而易见。不过,毕竟可以提示,开埠之前涉及天津的这大事变,曾足让可谓“近在咫尺”的京城皇家提心吊胆。

如果说,当年“粤匪”临津尚属“内乱”,那么,随后的“洋教”安家则属“夷情”了。“丙寅词”有谓:“玉皇古阁暮烟苍,望海楼存寺已荒。可叹登高人不到,飘摇风雨过重阳。”注云:“玉皇阁、望海寺楼均为从前登高之处。现望海楼已改为基督教堂。”^{[2](P474)}自是感叹本土的传统神祇场所争不过“洋教”。尽管这中间没有直接说到1870年的天津教案,但只要提及望海楼教堂,那一震惊中外的事件总会映入人们的脑海。该案不但在中国近代教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也直接连带着直隶及北洋的人事变动:教案发生时是由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他奉命赴津办理教案,被弄得焦头烂额,未及完案,李鸿章便接任其职,并很快兼充北洋大臣,这里也就成为多年洋务“大戏”的前台。对李鸿章在此的历史,“丙寅词”中颇有缅怀:“衙东残碣委蒿蓬,废宇名存万寿宫。影水楼台消夏便,前朝故事话文忠。”据注,“天津有李公祠三”,分别是祀明天津督饷总督李长庚、明天津巡抚李继贞和“清直隶总督李文忠公鸿章”者。前两祠或废或改,惟后者“现在河北省公署西”^{[2](P468)}。从“前朝故事话文忠”句看,作者对这位晚清坐镇直隶和北洋最久的“文忠公”是尊敬和怀念的。下“词”可为一证:“东南两局久无声,迁地仍推制造精。武备水师谁创设,苦心为国蔚干城。”注说所谓两局,“东局在大直沽东北,南局在城南海光寺,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每日上工、息工,以管放气为号”,并有“机器局即制造局”^{[2](P469)}的说明。显然,说的就是天津机器制造局(只是所称东、南两局通常更多以东、西两局称之)。该局作为北方设立最早且规模最大的军工厂家,其初创虽然不是出自李鸿章而是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但是从李鸿章主政直隶和北洋之后,接手操理并使之发展完善,此期为时更长且情形显著。由“武备水师谁创设”句看,“丙寅词”作者旨在褒扬李鸿章“苦心为国蔚干城”更铁定无疑,因为天津武备学堂、北洋水师,都是由李鸿章主持创设的。即使今天在我们看来,李鸿章包括经营天津机器制造局和建设北洋水师等在内的洋务活动,在当时特定社会条件下虽说并没有能收到预期实效(甲午战争的结局就不失为证明),但促进近代化发展的因素毕竟

还是有的,而其动机上也绝非尽出自私利,有“为国”的几分“苦心”也不应否认。

而无论如何,再经庚子事变,中国更是国难加深,危局愈重,天津则首当其冲。上引一“词”的注文中就言及,“庚子后两局改为俄、日兵营”^{[2](P469)}。前之“自强”军工厂家,竟沦为侵略军占据的兵营!这还只是变局的一幕而已,其事多矣。“天津关与匾俱亡,一战红巾已可伤。大慧力传乔耿甫,更怜神迹落扶桑。”此“词”说的是天津地方标志性文物被劫掠:“北门外茶棚庵悬有‘大慧力’三字匾一方,为邑人乔耿甫所书,笔法神妙,呼为神匾。有天津税关在北大关,有‘天津关’三字匾一方,字体亦佳。均于庚子之役被日本人运去。”^{[2](P467)}其“运”字显然不妥,哪是一般之“运”,实乃“掠”耳。经庚子之役,天津甚至“废四周城墙,改为马路”,“丙寅词”因曰:“出城一望几悲叹,剩有周围马路宽。不见崇垣森百雉,前朝空翎赛淮安。”并有注文述及城垣始建和重修的历史:“县城明永乐间筑,时称赛淮安。城周九里十三步,旧有城门四,东曰镇东,南曰定南,西曰安西,北曰拱北。清雍正年重修,遂改城门名称曰镇海,曰归极,曰卫安,曰带河。”^{[2](P461)}古遗城垣改马路,可谓变化沧桑,而此与庚子事变紧相牵系,“丙寅词”作者的“悲叹”也就不难理解。当然,他对外国侵略的揭露不够,更少义愤声讨,倒有“神拳祸国”的明言,“词”云:“神拳祸国损王师,痛煞将军革裹尸。战骨已陈碑尚在,伤心重谒聂公祠。”^{[2](P468)}“聂公”是指淮军出身的将领聂士成,需特别注意,此公是在庚子事变中在天津抵御联军侵略,而非与义和团打仗,在八里台阵亡的,遂于该地立碑,其祠是“在河北三条石后”。从上引词句中的“重谒”看,作者是不止一次地到这里缅怀先烈,而“痛煞”二字,更见其深情。这样看来,他是由衷崇拜为抵御外国侵略而捐躯的英烈的,而对义和团的“祸国”,无非是就其“惹乱”而言。

庚子事变中,天津作为联军集结的基地,不只是因为地近北京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基于开埠后列强在这里开辟并营建下据点。当然,天津开埠的影响又是多面、多重的。譬如商业迅速发展,即不失其一大要项。特色“品牌”,旧中加新,名目繁多,市面兴盛。“丙寅词”涉及的,像“狗不理”包子、“燕春坊”饺子、“沈家栅栏油炸蚂蚱”、“大水沟王姓卤味煮野鸭(‘鸭子王’)”^{[2](P479)}、“明顺昌、芦庄子、玉华斋酱肉”、“官南永三元”羊肉、“恩发顺”炖牛肉、“永远德涮锅子”、“穆奶奶家熬鱼”^{[2](P480)}、“小刘庄水萝卜”、“孟家豆腐干”、“张二炒人参果”、“丁伯玉糖墩”、“郑

记糖炒栗子”、“正兴德记茶叶”^{[2](P478)}、“一品香、胜兰斋、祥德斋”茶食铺^{[2](P478~479)}等,真可谓林林总总。餐饮著名场所,如“八大成”(八家名馆,沿袭称之,记时实不足八家)饭庄、“四扒馆”(“四扒”因食品样数而名,八样者即名“八扒”)^{[2](P480)}、“青莲阁、玉壶春”茶楼^{[2](P482)}等。这尽管属“地方特色”,但可以想见,其能繁盛,是离不开开埠后城市快速发展之“保障性”条件的。并且,因为“洋”之影响,新开场所装饰华美“中西两餐俱备”的“小食堂甚多”,也出现“堂馆均系女子”的馆所,“丙寅词”中有谓:“宫灯华丽穗飘扬,小饮端宜小食堂。独有松亭(地方名)饶兴趣,酒香不醉醉花(喻女堂馆)香。”^{[2](P481)}如果说,小而多的商所是商业繁兴一个层面上的表现,那么,“丙寅词”中所谓“大开商城辟商场”^{[2](P516)},则显然是更高层面上的景观。若干著名大型商场,在这里也日益发展起来,“丙寅词”中举及者就有“北海楼”、“德庆”、“天祥”、“康泰”^{[2](P516)}等。“坐贾”之外,亦多“行商”,而且多有远道以及至外域贸易者。“丙寅词”中言及,“津人赴甘肃、新疆及俄蒙一带经商者杨柳青人最多”,因路途遥远,往返自然费时,因有“雪花又似柳絮飞,重利商人尚未归”^{[2](P477)}的词句。在天津这样的开埠城市,商业上的中外竞争因素影响是很大的,像上面述及的“德庆”、“天祥”、“康泰”等大商场,当与开在租界有直接关系,有竞争优势,遂使得租界外的一些前有场所趋于“冷落”,这是从“丙寅词”的注说文字中能体察出来的。相关情况在水运业表现更为凸显。“丙寅词”中有云:“百货分征责任专,大关缺底化云烟。更闻番舶争输运,营业萧条养海船。”说的是天津钞关(“大关”)曾兼“养海船专跑锦州、牛庄一带,一年四次,获利甚厚。自有海关轮船(‘番舶’),遂“无形破产”^{[2](P513)}。究其原因,固然有“词”作者言及的天津钞关经营者“平日奢侈无度”,当还有严重贪污肥私等“弊端极深”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应还是无法与“番舶”竞争的“大势”因素。

开埠以后带给天津的既有城市快速发展,中外联系和交流直接而紧密,市面繁荣经济发展(起码表象上如此)的一面,也有社会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异愈发悬殊,底层人民生活相对愈发惨苦的另一面。这后者在“丙寅词”中也有所反映。“米珠薪贵甲长安,钱法奇荒财力殚。百物价如潮水涨,涨潮容易落潮难。”面对如潮水般上涨难以抑制的物价,贫困小民甚至连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事项也无法应付,所谓“开门七件须筹备,巨壑难填小火炉”;“窝窝头贵似黄

金,都是农民血淋淋”^{[2](P501)}。无奈借高利贷并且要分作日还的“印子钱”,则必遭“重利盘剥、滚叠折算”,所背上的简直就是“阎王帐(账)”,因有‘词’曰:“可怜剜肉自医疮,印子钱须日日偿。无怪登门尽穷鬼,始知放帐(账)是阎王”^{[2](P512)}。与之相形之下,则是“见有朱门日高起,朝朝酒肉侈池林”^{[2](P501)} 另一番情境,富豪们可以照常闲睡懒觉,天天酒池肉林。

二、对社会生活与风习情状的揭示

“丙寅词”中更多是对天津社会生活与风习的描摹,可谓展示了一幅斑驳陆离的“风土”画卷。

演艺娱乐方面,京剧、各种曲艺是传统项目,依然保持着一定盛势,老辈名流无论是存是亡,在人们心目中神圣不灭。“丙寅词”有谓:“内廷供奉几伶人,高引歌喉罕比伦。莫叹汪谭成绝响,白头犹在老乡亲。”所云“汪谭”,是指汪桂芳、谭鑫培;而“老乡亲”,则指时已八十多岁的津籍老伶孙菊仙,津人均亲切地“呼为老乡亲”。与此同时,崇尚新奇的趋向亦愈发彰显。像“非北京科班出身”的所谓“外江派”所演荒诞新剧,也很受欢迎,所谓“戏派年来尚外江,行头砌末号无双。连台新剧多荒诞,休要苛求字调腔”^{[2](P517)}。戏剧、曲艺之外,电影自属较新品种,影院应时发展,也扩展了演艺舞台,时有艺人光临,“丙寅词”有谓“三日新人银幕开,献身歌舞又登台”。还有时称“洋蹦蹦”的跳舞,这种新兴娱乐形式也兴盛起来,甚至饭店里时作舞场:“婆娑舞蹈夜登场,一曲熏风送汗香。座有乡人恍然悟,原来蹦蹦出西洋。”^{[2](P521)} 娱乐场所多有新辟,新盛老衰其情凸显。“歌舞楼台日喧阗,四大名园已不全。偶约新明观剧去,买车犹说下天仙。”“丙寅词”中此首,就能说明这样的情况,其注文曰:“天津旧有戏园四:庆芳园在袜子胡同,金声园在鼓楼北,协盛园在侯家后,袭胜园在北大关,或改建,或停演,已非当年之热闹矣。日租界新明大剧院,为下天仙旧址。”^{[2](P516~517)} 甚至昔日荒僻可怖的坟地,于今已成热闹非凡的戏馆,像“丙寅词”中所写及的河东“天仙茶园”,即可谓典型一例:“河东戏馆说天仙,夜半归来月色妍。犹是朱家坟地界,行人不怕鬼来缠。”^{[2](P517)}

租界与天津娱乐场所的兴衰变迁自有密切关联,而“洋技”也颇能打开场面,吸引观众。譬如杂技为中国本有,而此时日本者魅力尤显。“丙寅词”中有这样一首:“东洋马戏赌争先,绳橛唐梯自古传。急讶美人天上落,身轻于燕逐秋千。”注云,碾轮于绳

上(绳橛)、上高竿(唐梯)之类“我国古皆有之”,“日本马戏各种技艺均臻佳妙,惟最后之秋千,空际飞舞,炫目惊心,尤绝技也”^{[2](P495)}。较比杂技,娱乐兼体育事项的“跑马”更具洋味儿,它最初引进,跑马场自为西人独开,而后即有华商效法,并且购票入内活动者热烈非凡,所谓“早辟西商跑马场,春秋今又赛华商。性如彩票人争购,绿女红男举国狂”^{[2](P495)}——由“丙寅词”中的这首即可得印证。

娱乐休闲对新潮的情侣恋人们自然是上佳活动。“屋顶游园最上层,与郎挽臂喜同登。昨宵未预乘凉约,勿吃香蕉冰激凌。”这可谓“丙寅词”中关于恋人游园的一幅写照,后两句似甜蜜的谜语,可知那时早有“冰激凌”的“登场”了。再看此首:“倩影喁喁话柳阴,灯明不觉月光陈。别时密订来朝约,座假东街起士林。”据注“起士林在特别一区中街,洋点心最佳”。街上柳阴里依依不舍地话别之后,相约明早起士林品尝上佳的洋点心,足见这对情侣的浪漫。“汽车无事且兜圈,晚景苍茫暑热天。行至海关仍散步,徜徉河岸数轮船。”^{[2](487)} 那时能乘汽车“兜圈”,又至海关下车散步,能有此条件的自更非寻常之辈。而夜生活场所的条件也能满足所需:“午夜丁东漏箭催,陶园宽敞足徘徊。自看時計归还早,又到神仙世界来。”从注说文可知“陶园”和“神仙世界”都是游乐场所,前者在原德租界地方的特别一区,后者在日租界,原即“神户馆”,是新改的游艺园,所谓“時計”为“日语钟表之通称”^{[2](P486)}。时至午夜还觉得回去尚早,再到另外一处,看来是要通宵游乐了。还有开房幽会者,“丙寅词”中也有涉及:“君家何处问檀郎,更恨侬家道孔长。旅馆房间开甚便,春晓双宿两鸳鸯。”注云:“各饭店旅馆,时有男女借地幽会,谓之开房间。”^{[2](P487)} 可知,暧昧意义上“开房(间)”的说法,那时就有。

当然,那时不消说“幽会”,明里的色情场所都是合法存在的,并且,娱乐或即与色情密切关联。譬如“落子,即唱莲花落者,其始寄居于茶园酒肆,无异流娼。后即开设茶园,并将妓馆附居园之左右”,“庆云、权乐、群英、中华、同庆均落子园名,惟中华、同庆开设最早”,这可谓“津门特色”,因为“京沪及各省会商埠均无此游戏场,故初来津者无不以先睹为快”。因有“词”云:“庆云权乐继群英,同庆中华早著名。落子园应推独步,敢骄上海薄京城。”而作者又特别道明:“然实亦天津娱乐场中之一污点也”^{[2](P521)}。何作此说,就是因为与色情的联系。“丙寅词”中有进而这样状描落子园情形者:“拉架先开拾不闲,登

场雏妓耸云鬟。栏杆两面都凭遍，为使人人见玉颜”；“人来选色且征歌，燕瘦环肥斗绮罗。欲识枇杷门巷处，芳名注意听皮靴”；“撮活先将折扇留，捧人不惜锦缠头。满台随便歌方始，玉臂双携已下楼”^{[2](P522)}。如此看来，到这样场合有的人真正目的“征色”当更真于听歌赏艺了。至于妓馆，“丙寅词”中更多涉笔。有谓：“花妍月媚六街春，部落区分姓氏新。自筑香巢三不管，侯家后渐少游人。”据注，“三不管”即南市地方，当是妓馆新兴区，而旧有的侯家后地方妓馆，冶游者也就相对稀少了。又有谓：“天宝笙歌夜复晨，高车驷马动香尘。李妈呼小何曾小，大腹彭亨发似银。”注云：“东天宝、西天宝，为妓馆之最年久者，小李妈所开。”^{[2](P523)}可见，这家年久妓馆，依旧兴隆。妓馆亦分等级高下，像在北大关东北的“落马湖”，在南市的“红叶村”、“翠柏村”，“皆最下等娼寮”。而“日租界四面钟后及福岛街之天安里，暗娼甚多，俗称‘暗门子’或‘半掩门’”，因有“词”曰：“四面钟旁马车喧，天安里外月黄昏。嫣红姹紫花如海，半掩春风一扇门。”妓界招揽之外也不乏欺诈，“有暗娼处，每当夕阳西下，各巷口有多人鹄立。见来往行人辄尾随低语，不曰某处住家清静可逛，则曰某处有女学生何妨前往茶叙。絮絮烦烦，厌人闻听”。因有“词”云：“薄醉归来独夜行，花明柳暗巷纵横。厌人蜂蝶争媒介，谬说新来女学生。”^{[2](P525)}其实不止妓界，当时各业欺诈现象多有，是社会乱象的重要表现。就拿旅店来说，“丙寅词”中有这样一首：“车站区分东总西，轮船搭客日栖栖。旅行到处皆荆棘，住店须防是野鸡。”^{[2](P501)}看来“野鸡店”那时天津就不少有。此种店的欺诈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色情陷害”当不失惯伎。色情场所、妓业败坏和毒化社会风气自不待言，官方尽管不为禁止，但劝妓改业从良的做法还是有的，也确有批量的人从之，但她们一时难以“脱胎换骨”，装束和消费生活还是和常人有别，容易识出，并有特定称谓，从这首“词”中就能反映出来：“恒利归来又物华，珠围翠绕下香车。令人一望知窑变，举止风流逊大家。”据注，“恒利、物华为津埠之大珠宝店”，“从良之妓呼为‘窑变’”^{[2](P489)}。

妆饰方面，也是“丙寅词”中颇为注意的。如当时旗袍流行：“过膝垂垂长坎肩，栏杆不饰饰花边。今知满汉无区别，都着旗袍一裹圆。”又记为赶时髦，“妇女外衣或大擎斗篷随时改变新样”，“词”云：“外衣花色逐时髦，不怕风寒似剪刀。为出风头标特志，周身领袖出凤毛。”^{[2](P488)}又有：“围巾披擎著花冠，两袜偏教薄似纨。坠指裂肤都不惜，为摹时样耻言

寒。”甚至为显穿高跟鞋而不坐车，约伴在并无烈日时候撑伞徒步：“高跟鞋子最适宜，绸伞圆撑日正迟。为约意中人散步，来回都不唤胶皮（称洋车即人力车为‘胶皮’）。”有的则喜戴墨镜、蒙面纱：“蓝光眼镜衬腮红，湖色纱将粉面笼。岂是含羞怕人识，芳尘一路扑回风。”^{[2](P489)}立时效法自海外归来的朋友穿着西装，则成为新潮男子的得意之举：“双瞳非碧又非黄，交际娴于姊妹行。昨喜有朋海外归，今朝得意服西装。”还有女子作洋式发型，甚至到理发所去，也成时兴：“呼佣窗下晓梳头，时仿东洋时仿欧。理发喜今有专所，侬家不必起妆楼。”^{[2](P488)}

风习上的“趋新”，在喜庆礼仪、称谓之类事情上也可见一斑。如渐兴的新式婚礼上，一概免除了“所有旧式拜堂、坐帐、喝交杯酒、吃子孙扁食（水饺）之礼，而这样进行：“指环互换缩同心，不用交杯酒再斟。宾致贺词主申谢，堂前应节奏风琴。”^{[2](P491)}“博戏”也成为喜庆活动中的惯常内容，“恒以麻雀（即麻将）、扑克等牌为消遣”，所谓“喜庆宴开灯彩红，宾来博戏漫成风。洋洋声浪盈人耳，不是三元便四同（‘三元’、‘四同’分别是玩麻将、扑克中的术语）”^{[2](P493)}。外语称呼在日常也派上了用场：“人约良宵底事迟，如年更鼓力难支。倦凭沙发方思睡，忽听声声唤密司（miss）。”不难想见，主人公必是个典型的时髦女郎。

科技对新潮社会生活的重要推动，在“丙寅词”中也有醒目反映。如电话热兴，争相安设：“话传一线电流通，分局新添北与东。用户愈多机愈少，岂真应付有时穷。”注云：“电话旧有总局、南局，本年添设东、北两局。惟用户安装电话机，非设法运动，辄被搁置。”可见电话已是大受欢迎，供不应求，要靠“关系”才能比较及时安置。无线广播更是让人深感玄妙，“词”谓：“无线发明消息灵，高竿千尺接青冥。电机广播尤玄妙，天上霓裳亦可听。”^{[2](P502)}俗称“话匣子”的“留音机”，不但越来越多用，而且有了“名牌”。“丙寅词”中言及，“所制戏片，中外南北名伶名妓俱备。惟津伶孙菊仙独不留音，亦别有见地者也”。并专置这样一“词”：“珠走盘旋即可听，精制百代与高亭（‘百代’、‘高亭’皆公司名）。留音但恐知音少，一曲阳春鬲老伶。”^{[2](P503~504)}家用方面，门铃的安置业已“多有”，当然，一般应是“深宅大院”人家，词谓：“双扉深掩杏花红，将命惭无五尺童。客到不闻声剥啄，小铃传入语玲珑。”^{[2](P502)}暖气和电扇则给使用者带来特有的享受和情趣：“暖气回旋一管通，春生绮室乐融融。只愁客到围炉饮，绿蚁重温火不

红”；“不用丝牵与布蒙，电轮吹转自扇风。儿童举手笑相问，谁把风车挂半空”^{[2](P503)}。这类“日用科技”，应用当然主要得是富裕阶层的事情，但不能因此轻忽它在社会生活与风习上的标识和引领意义。

慈善事业当然有助于营造社会良习。传统的慈善组织惯以“善堂”称之，“丙寅词”中有谓“天津善堂甚多，联合称之曰‘八善堂’”，募赈放赈当为其主要职事，因有“词”曰：“募捐呼号放赈忙，擎窠大字贴高墙。救全妇孺知无算，颂德歌功八善堂。”本有之外，又有外地人士在津举办善堂，如由“苏浙皖三省士绅筹办，历有年所”的“广仁堂”便是一例。而“红十字会”之类机构的建立，自更属新生事物，不过，由“天津道院”成立者，在有“救济灾民伤兵是夥”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却又不免带上一丝滑稽，就是“遇事均先请乱判奉行”，毕竟是“道院”所办。就相关事项，“丙寅词”中有这样一首记之：“南中善士遍三津，功效昭然首广仁。救济会成红十字，半由人办半由神。”筹赈义演也时常有之，“散座三、四、五元不等，包厢竟定价百元”，因有“词”云：“非筹急赈即冬防，票友伶人义务忙。半为助捐半娱乐，百元不惜定包厢。”^{[2](P500)}看来，这时定包厢的富人们捐助当更重于娱乐了。演艺界之外，像书画家也慷慨助赈：“书画家仍慈善家，鬻资助赈惠无涯。御冬款待年中放，贫士从容度岁华。”^{[2](P497)}津门善风，与时代进步相连，也与当地人情特点分不开，即“人多慷慨，乐善好施”，而又喜争胜好名，有“词”曰：“性情慷慨乐捐输，甚至虚名亦愿沽。最喜人前翘巨擘，亲朋争道不含糊。”^{[2](P526)}无论如何，在义捐助赈方面踊跃，毕竟是促进良善风习的好事。

就风习变化而言，“自发”、“自然”因素固然重要，而人为干预也需关注。“丙寅词”中就记及当年官方对女子剪发的干预之事，说“(丙寅)夏间，警厅曾拘捕剪发女子，并出示禁止”。因有“词”曰：“挽风盘鸦说不兴，齐眉覆额发鬅髻。无情警士横干涉，弱质何堪受薄惩。”^{[2](P488)}为所谓“挽风”由警方出面干涉发型，似乎太不尽情理了。不过，当年天津的“警政”可是颇为有名的，这从清末新政时就打下了基础，维持社会“良俗”也是其职责内之事，当然，社会治安更是其职责所系。“丙寅词”中因谓：“警政从来数北洋，经番变乱绩尤彰。赠联特载星期报，留得千秋姓字香。”注说：“每次变乱，警察极力维持秩序。商民称颂，特请绅耆书联赠谢，并将警官和警士姓名、事实，联语登报宣扬。”^{[2](P499~500)}应该说，维持治安才是比女子发型真为当管之事。陋俗恶习的禁止，

若官方真能致力并有实效，自大有益于社会，只是未必能做到而已。反正当年陋俗恶习的存在也是很醒目的。

像烟毒泛滥。对吸者难戒，贩者暴利致富，“丙寅词”有这样一首专写：“骨凡欲换有金丹，痼疾终身戒更难。不愿害人惟利己，贩夫多已面团团。”注云：“金丹即白丸，其害较鸦片、吗啡尤烈，贩者利亦极厚。有某贩已在租界中广置楼房，居然成富家翁矣。”就禁烟而言，在天津存在本方与租界的不能协调、各行其是的现象，故而大大影响了效果。“丙寅词”中有谓：“我国禁烟已非一日，而租界贩运售吸均不能免。本年当局又遍设禁烟局发给牌照（自意味着可‘合法’经营），而租界中反行严禁，屡破获大案。”因以“词”云：“功令皇皇禁寓征，莫云化外便开灯。迩来几破烟霞窟，半在岑楼更上层。”至于烟草制品的售吸，更是普遍。销售广告竟不顾观瞻，曾在重建的金刚桥上大幅高挂，只是因为舆论反对，才被迫撤下，“丙寅词”记曰：“重建金刚新铁桥，香烟高处画商标。若非舆论时攻击，广告谁能立取销。”此烟销售自为税收要源，于此也不免华洋之争，“丙寅词”中交代，“自(华界)设立卷烟吸户特捐，政令不行于租界。吸户图贱，往往特至租界中购买，华界烟商销路锐减，然亦偶有稽查查获受罚者”。“词”谓：“卷烟普及甚洋烟，耗费金钱莫大焉。一自特捐加吸户，华界销售不如前。”^{[2](P514)}竞争激烈，说明消费可观，吸者之众。

再如迷信依然颇为盛行，像信巫驱病：“神来吃语听模糊，病不求医反信巫。圣水药丸本无验，香资事后苦追需。”注语中言及，巫家看病，“病愈则以功自居，不愈则诿为命尽。愈后任意需索香资药费，愚昧无识及小家眷属恒信之”^{[2](P505~506)}。“有人崇拜在门头，丸药香灰任汝求。方谓炉中丹九转，那(哪)知疗治疾难瘳。”这则是说“崇信天地门、老君门等教者”，用“法亦近巫”^{[2](P506)}的特定方式治病，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实效。以占卜相面招摇撞骗者“甚多”，他们“时发传单于路人以广传播”，“丙寅词”中有记：“遍撒传单逐格尘，自夸卜相验如神。知君不是君平隐，介绍芳名尽伟人。”^{[2](P507)}此外，像烧香求“仙”、许愿还愿之类事情更多有之，“蓬头跣足状如狂，村妇虔心烧拜香”^{[2](P508)}；“供奉仙龕五大家，无非狐鼠猥鼯蛇”；“四年为愿三年满，佛号哀呼有万千”^{[2](P509)}，如此等等，不失逼真写照。至于祈雨之类，更是无论官方民间都行的群体活动，只是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祈雨掩门插柳枝，磨刀会过尚无

期。民间俗与官家异，不请龙王请马皮。”这便是专写官民祈雨事的，注说更为具体：“官家祈雨，设坛焚香，召集僧道诵经，供奉龙王，用瓶取水。并传令商家遍插柳枝，门首粘贴‘天降大雨’、‘商民鼓舞’等黄纸条。乡民求雨，拥一人头顶神马，若巫之顶神状，向水沟等处烧香，谓之请马皮。俗称五月十三为关公磨刀赴会之期，是日必雨，故有‘大旱不过五月十三’之谚。”^{[2](P510)}对民间来说，这固然带有些民俗色彩，但迷信本质不可否认。包括前述迷信事项，信行者一则是限于文化愚昧，再则也是出于无奈。在大自然面前无奈，日常更多的是在灾病面前无条件寻医问药的无奈。而到那个时候官方还以迷信方式布置祈雨，就不免有些滑稽了。而“丙寅词”作者，对各种迷信事象倒是或显或隐地都持否定态度的，表现出在这方面的明智。

三、“丙寅词”作者的主观条件及作品的史料意义

冯文洵之所以能有“丙寅词”这样的作品，当然与他特定的生平履历分不开。不过，作者算不上显赫名流，所查见的关于他的记述和介绍不多，简略却又有歧异，有必要先就此作个大概的梳理。

其人祖籍天津，出生在同属直隶的涿州，这确凿无疑。有记其为“涿州人”者，也有记其为“天津人”者，自是各以其出生时籍贯和祖籍所致的不同。关于其生卒时间及去世地点的记述更存歧异，于此之正确答案自然只能是唯一的，不可能彼此皆然。绝多记其出生于1880年，这当是对的（从下述他的相关履历事项可获参证），也有记其生于1888年者^{[4](P42)}，当误。其去世的时间、地点，或具体说是1933年夏在北平^①，另亦有其卒于1934年之说，则疑误。其主要职事履历：曾在四川成都从事过警务工作^②，1914年赴黑龙江，1917~1921年间先后任泰来、海伦县知事（相当县长），1928年再至黑龙江，曾任该省政府秘书，1931年“九一八”后“归隐天津”^{[5](P154)}。实际也非完全“归隐”，其间他起码曾接替汲绍宗充任河北省北运河河务局局长^[6]。并且，这也不是他初至天津，早在1897年18岁（虚岁）上他就到过这里（算来正是1880年出生），1904~1907年间还曾在此学习，1912年又不止一次地来过^[7]。他对这个祖籍城市当早已熟悉，而为之所作系列竹枝词，题中“丙寅”为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此间当然也必在此居留。这一是从有些篇什文辞中即可证明，再就是从上边根据资料所述其履历中，由其

1928年“再至”黑龙江，可知此前一段时间里当是不在那里的，这样1926年曾在天津就更得支持。其“丙寅词”有些曾陆续刊载于（天津）汉文《泰晤士报》附张^[7]，后汇编成书于1934年出版，或说亦是由该报铅印（国家图书馆“文津”藏本1934年版同名之书，出版项注记为“出版者不详”），若是，则当与他生前涉其“报馆笔政”^{[8](P135)}分不开。可见，政事之外他又长于文事。或说其“能诗善画”，为天津城南诗社主要成员^{[9](P67)}。还需注意，此人即现代著名作家和学人冯至先生的三叔父，冯至晚年在给人信中，强调在其伯叔姑中要特别一提的，就是这位三叔的“能诗、善画”^{[10](P356)}。综上，可以这样说，冯文洵对祖籍之地自会有特别关注之情，再加多次在那里居留，亲临其境而更触景生情，又有诗才可恃，便以竹枝词的合适体裁抒写连篇，自为顺理成章且驾轻就熟之事。

至于“丙寅词”的史料意义，试从以下方面概略言之：

第一，从该“词”的体裁门类看。首先，它是属文学大类中诗歌的一种，而不是专门的写史篇什。“诗”不只是具有文学价值，也可有它的史料意义，所谓“以诗证史”，即治史中使用史料的门径之一。而竹枝词，又不是一般的诗歌，而是和“史”尤为贴近的一个特类。它滥觞于唐中叶，而“宋元以降，作者寝多”，其“形式与七言绝句无异，内容则以咏风土为主，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可抒写”^{[1](唐圭璋序，P1)}。再就是，其文词上一般比较直白和通俗。冯氏所作关于天津的“丙寅词”，即典型如此。并且，值得注意，除个别之外，其每首“词”后都有长短不一的注说、解释性文字，字数一般要超过诗者，长的达200来字。这不但便于读者理解诗句本身，而且更有“诗外”的补充性交代内容，与诗句珠连璧合，相辅相成，更增加了其史料价值。再者，它尽管每首都相对独立，但近三百首都集中写天津一地，成系列性，且有些是连续多首集中写某一个方面的内容，“散”中有“整”，这也更能增强其史料性。当然，它毕竟属文学的诗歌门类，表述方式上，对历史内容的反映，总不比专门写史的篇什那样直接和系统。不过，它就像色彩斑斓的贝壳群，可供人充作择取“拼图”的原质素材。

第二，从其题材内容来看。作为竹枝词，正如前边引录的前辈权威专家所言，内容是“以咏风土为主”，“丙寅词”则是以吟咏天津风土为主，当然也兼涉其他方面，但毕竟不是社会全方位协调系统的史料集合。这一则是“体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其

“题材”，再则也受作者主观因素的制约。如其社会地位、群体所属、接触范围、情趣所在、关注目标、立场观点等等，自然都会对他的笔触产生直接影响。能写到什么而写不到什么，写到的又怎样去写，感受如何，这都是受其主观条件制约的。譬如说，作者虽说不是对社会底层没有一些关注，相关事象有的也进入其审视和写作范围，但总体而言，这方面内容较少，更多而集中的还是上流社会生活、风习方面的事情。当然，诸多写物象、环境、一般风土人情之类内容者，或不会凸显社会阶层上的特指性，这另当别论。总之，就“丙寅词”的题材内容而言，诚不失为以天津风土为主而兼及社会多方面内容的“万花筒”。

第三，就对其解读方面而言。“丙寅词”从文字形式到内容，自然都是既定而固化的。将其作为“史料”并进行解读，则不同解读者可有其不同的视角、注重和理解^④，而在这个过程中，“丙寅词”的史

料意义，自然即得以具体的特定体现。在本文的特定视角、视域之下，体察“丙寅词”对于认识近代天津社会情状所具有的史料意义，觉得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是它提供了诸多就特定时间而言可谓“静态”而从情景、场面来看又是生动的写照，犹如一轴繁多画面合成的长卷。二是其本身也有些是具备历史跨度的“动态”记述，对认识天津近代社会变迁能提供直接参考和具体的史料支撑。三是其内容复杂而具有多重、多面性，据以有助于体察和阐释在近代特定条件下，天津地方文明进化与社会沉沦之间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情状。当然，无论如何，“丙寅词”所能反映的，只能是词作者所认知并以特定体裁形式记录下的近代天津社会的斑斑点点。而本文所做的，主要只是在“由斑窥豹”的立意下，将其一些“斑点”串接和整合起来的审视和解读而已，以期对认识天津社会的近代变迁能有所助益。

注 释：

- ① 李兴盛主编《黑龙江历代旅游诗选与客籍名人》(版本见本文“参考文献”[5])中有介绍冯文洵的文字，即说他其时“卒于旧都(北京)”(见该书第154页)，北京时称“北平”。时间、地点说得都较具体，当有本而可信。另，柯愈春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册第1995页，也记其人“卒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
- ② 据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近代人物录》(版本见本

- 文“参考文献”[9])中《冯文洵》条，条中还记其“北京警官学校毕业”。
- ③ 本文参考文献[8]中对冯书之名录为《丙辰天津竹枝词》，“丙辰”当误。
- ④ 如见有王兆祥的论文《〈丙寅天津竹枝词〉与近代天津世俗文化》(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007年第1期)，即属另一特定视角者。

参考文献：

- [1] 丘良任. 竹枝纪事诗[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 [2] 雷梦水等编. 中华竹枝词(第一册)[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 [3] 罗澍伟. 近代天津城市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4] 张金刚. 天津农情诗选[J]. 天津农林科技,2010(2).
- [5] 李兴盛主编. 黑龙江历代旅游诗选与客籍名人[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 [6] 训令(公文)[J]. 河北建设公报,第五卷第二期(1932年11月

- 刊行).
- [7] 张秀英. 冯文洵与《丙寅天津竹枝词》[EB/OL]. 系挂网宣传拍卖文稿(有编辑修改字符)的首页照片.
- [8] 陈光贻. 中国方志学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9]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近代人物录[M]. 天津: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印,1987.
- [10] 冯姚平编. 冯至全集(第十二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The poems by Feng Wenxun and modern society of Tianjin

DONG Cong-lin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 poems written by Feng Wenxu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biography and kaleidoscope of modern Tianjin in relation to politics, economy, and folklore. Feng has his passions for, and understandings of the social changes of Tianjin well expressed.

Key words: poems of Tianjin; Feng Wenxun; modern life of Tianjin

[责任编辑 周祖谦]